



□ 石志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天人合一

众。随着人类认知的进步，天逐渐被理解作为一种具有道德感的力量。《周易·乾》中指出，人要“与天地合其德”。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天人合一”命题：“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张载提出“天人合一”理念，去除了“天”的神秘色彩和道德说教内容，强调个体通过勤奋和努力，可以实现远大目标。“天人合一”中“天”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天人合一”中的“天”指的是最高主宰。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的治政思维需要从马上得天下转变为马上治天下。汉承秦制虽然稳定了汉朝的统治秩序，但是从宏观上考虑，更需要一种长远的治国之道。汉朝统治者需要确认的治国之道在政治实践中完成验证，以期确保其政权的长治久安和施政的长期信心。研究儒家理论的大思想家董仲舒适时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将自然原则、伦理道德和神秘主义等要素融为一体，以天人视角为切入点，试图提出一整套政治理论来服务当时的政治。他的政治学说被汉武帝采纳，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大一统局面。董仲舒通过倡导对“天”的敬畏，让统治者能够养成一种敬畏心，在治政活动中切实做到不滥用权力，还要经常地做好事施仁政，通过这样的引导，更能促进对权力的有效规约和秩序的有序维护。人们对“天”倾注了太多的理想，其中就有将中国人最为看重的道德，赋予了“天”，使之成为最高道德评判标尺。比如百姓常言：“吉人自有天相。”这里的“天”就具有了道德评价的色彩。人们只要去做好事行善事，道德感增加后，定会受到“天”的“照顾”。再比如百姓说：“对天发誓。”这句口头禅为什么在百姓心中分量很足，因为，百姓将“天”作为道德最强的事物去对待，对“天”起誓，不仅诚意十足，而且还有很强的道德承诺意味。

二是“天人合一”中的“天”指的是自然界。《周易·泰》中指出：“天地交，泰。”这段话意思是天地交合才能使万物生长，永葆生机。《周易·序卦》中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天孕育了万物包括人类。陆景在《典语·君道》中也表达了这种思想：“夫天之育万物也，耀之以日月，纪之以星辰，运之以阴阳，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天不亲事而万事归功者，以所任者得宜也。”既然天（大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就应该以对待父母的方式对待天。人类在与自然长期的关系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畏惧自然阶段。先民由于生产工具的简陋和智商的欠发达，对比自己强大很多的自然界

事物有一种天然的畏惧害怕心理，担心被其吞噬，故事事服从自然。第二个阶段是人征服自然阶段。随着社会进步、生产工具的优化及人的智商的提升，人类具备了征服大自然的条件和能力，开始以大自然为对象，推行工业化做法，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促进了社会发展与进步。第三个阶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阶段。人在征服大自然过程中，产生了资源掠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紧迫问题不光是要治理已经存在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更要转变发展思路，提出适合人类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方能共存共发展。中国古代所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其中“天”又指的是大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要求人类善待天（大自然），天（大自然）方能善待人类。“天人合一”思想又重新焕发了它的魅力，为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

三是“天人合一”中的“天”指的是最高原理。《周易·坤》中指出：“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里的“天”指的是天道，从哲学范畴去探讨，那就是最高原理，意指规律和法则。这种规律和法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体现在气候规律运用方面。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是国策。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一定要遵循所谓的“天道”，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如若不遵守这样的农业发展规律，定会受到惩罚；当然，如若遵守这样的农业发展规律，定会获得粮食丰收，不仅会促进农业生产，而且还会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体现在入世方面。古人言“天不亏人”，只有遵循“天道”，遵守一定的社会规律，多做顺应历史潮流的事情，人类就不会被亏欠。这就促使中国人能够跳出个体小我的视角，站在“天道”的高度，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以较强的大局观去谋划全局、推动工作、处理问题，往往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得到人们的认可。

“天人合一”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中国人理解、认识、分析世界的重要工具，正如葛兆光在《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中所说：“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不仅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空间与时间，还是人类理解和判断一切的基本依据。”



弃粮种桑终误国

□ 潘 晓

端牢自己的饭碗，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是一个强大国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管子·轻重戊》记载了一则“种桑误国”的典故，讲的就是手中无粮、遇事则慌，最终害民误国。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春秋时期，齐桓公采用管子的计谋，故意抬高高绌（丝织品）的价格，引诱鲁、梁两国放弃粮食生产，举国种桑织绌，结果在短短三年内，鲁、梁两国因为粮食短缺造成内乱，最后被迫归顺齐国。

（一）

自东周开始，周朝逐渐由强转弱，王室日益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一些小诸侯国先后被吞并，中国进入春秋时期。列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就是一名带领齐国走向强大的著名诸侯国君。在其统一大业的进程中，鲁、梁两国的归顺，是通过引诱其种桑织绌、放弃粮食生产来完成的。

身处群雄纷争的乱世，齐桓公企图吞并周边的鲁国和梁国，却一直没有找到可行的办法。齐桓公深知，如果同时对抗这两个国家，必然使自己的国家陷入被动局面。一天，他向管仲征求解决之道：我国毗邻鲁国、梁国，这两国对于我们齐国，就像田地边上的庄稼，蜂子身上的尾螫，牙齿外面的嘴唇一样。如今，我想攻占鲁国和梁国，怎样做才是上策呢？

管仲沉思片刻，答道：“鲁国和梁国的百姓，素来以织绌为业。您现在带头穿绌料的衣服，令左右近臣也都穿，老百姓自然也会跟着穿。另外，您还要下令齐国国内不准织绌，这样齐国对于绌料的大量需求必然会仰仗鲁、梁两国，

而这两个国家为了追求高额利益，举国上下就会盲目织绌，从而放弃农业生产，用不了很长时间，鲁、梁两国就会缺乏粮食了。”于是，齐桓公就在泰山之南做起绌服，十天内就做好穿在了身上。

（二）

齐国还要求大臣们都必须改穿绌服，同时命令齐国百姓一律不准织绌。正所谓上行下效，齐国的老百姓看到王公贵族都穿绌服，于是纷纷效仿。一时间，齐国绌制品价格大涨。管仲又对鲁国和梁国的商人说，谁如果贩来绌一千匹，那就赐给他三百斤金；如果贩来一万匹，那就给三千斤金。这样，鲁、梁二国即使不向百姓征税，国家财政也足够充盈了。

鲁、梁两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便下令鼓励百姓大力织绌，商人从百姓手中收购，百姓手里就有了钱，再由商人把绌运到齐国卖高价，商人也可获取高额利润。于是，织绌之风风靡鲁、梁，大家争先恐后制作绌服，短期内鲁、梁两国财政“外汇”收入丰厚，“外贸”顺差猛增。鲁、梁两国老百姓几乎全部出动，忙着种桑织绌，总觉得种桑织绌能够挣到大钱，粮食价格很低，挣不到什么钱，自然不重要，再也没人愿意种庄稼。

过了十三个月，管仲派人到鲁、梁分别探听情况。只见两国从事织绌的人口众多，城郭内贩运绌的商贩忙碌异常，道路上尘土飞扬，十步内都互相看不清楚。走路的几乎脚踩着脚，坐车的车轮碰着车轮，骑马的列队而行。眼看时机成熟，管仲对齐桓公说：“可以拿下鲁、梁两国了。”桓公问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管仲答

道：“您现在应当改穿帛料衣服，带领百姓不再穿绌。除此之外，还要封闭关卡，断绝与鲁、梁两国一切经济往来。”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突然改穿帛料衣服，也禁止百姓再穿绌服，关闭与鲁、梁之间的边境通商口岸，禁止一切贸易往来。一时之间，鲁、梁两国生产的绌料再也无人问津，老百姓顿时失去了经济来源。

（三）

民以食为天，但粮食生产非短期能够完成。由于鲁、梁两国忙于种桑织绌，疏忽了农业生产，国家粮食储备紧缺，吃饭成了大问题，两国百姓陷入了饥饿、困顿、恐慌之中。十个月后，管仲派人去鲁国和梁国打探，看到“鲁、梁之民饿殍相及”，连朝廷急需的赋税都交不起。鲁、梁两国国君这才意识到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急忙命令百姓返农，但是为时已晚，粮食不可能在短短三个月就能产出。于是，鲁、梁两国陷入了严重的粮食危机，谷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社会经济随之凋敝。

此时齐国趁机抬高了粮食的价格，本国的粮价每石才十钱，鲁、梁的百姓从齐国买粮每石却要花上千钱。为了解决百姓吃饭问题，鲁、梁两国只能咬牙花费巨资从齐国买粮。

两年后，鲁国和梁国国力衰微，老百姓有十分之六投奔了齐国。

三年后，鲁国和梁国国库空虚，百姓几乎逃亡殆尽，国家已经名存实亡，两国国君请求臣服于齐国。



儒家歌颂人类的创造之力，将人视为与天地之共创者，以创造为使命。创造财富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贫穷往往意味着苦难。任何理想社会形态的建构都不能背离财富的支撑，如何面对财富，是关乎社会、人生的大课题。如众所周知，《大学》作为儒家四书之一，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面对财富这样的大课题，提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的财富观。

滋生财富的土壤：德

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人们向往富贵、厌恶贫困，这是人之常情。孔子曾特别坦诚地以自身为例，提出若是可以求得财富，哪怕是做看守市场大门的“执鞭之士”，自己也是愿意的。看来在追求财富上，人人都有了一颗热烈恳切的心。正因如此，强调财富来源的正当性就更加重要了。在财富欲望的驱动下，“见利忘义”的心会蠢蠢欲动，稍不留意，就会迷失方向。所以，孔子常常叮咛“义以为上”“见得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财富来源的正当性在于“义”，在于“德”。关于美德和财富的关系，《大学》明确地提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如果将财富视作一棵树，这棵树需要牢牢地扎根于土壤之中。美德，正是滋生财富的土壤。唯有美德之土壤肥沃，才能源源不断地为财富之树输送营养，使其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大学》以“德”和“财”的关系为主线，详细描述了财富的创生过程：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在农耕文明背景下，财富主要来自土地，土地需要人来耕耘，而人口

需要有德之人聚集。君子有德，方可使得民众近悦远来。于是，有德、有人、有土、有财、有用，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勾勒出财富创生和使用的全过程。

“德”是《大学》经文中的高频词，“明明德”“克明德”“慎乎德”多处可见。那么，如何是有德之君子？换句话说，什么是衡量君子有德的标准，尤其当具体面对财富时。儒家谈“德”，并非仅是徒劳的情感，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人心与人性，以满足引导人的天性为根本。那么，大部分人心里面都在想什么呢？《大学》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君子和小人都是从社会地位上而言的，小人并非特指道德低下者，而是指小民、百姓。对于老百姓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过上好日子，过上好日子需要物质基础、需要财富支撑。所以，真正的有德之人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能够将他人的利益放在心中，时刻想着为他人创利，散财予他人。唯有做到这一点，才有资格聚人、有人，进而有土、有财、有用，进入财富体系的正向循环，走向良性发展的大道。对此，《大学》言“财散则民聚”，将这层意思讲得清晰明朗。当面对具体的财富问题时，以散财来聚人就是有德者的具体行为。

《大学》中的财富观

□ 李文文

散财和生财矛盾吗？《大学》中的财富观看得很是明白，两者之间不仅没有矛盾，且互生互养，散财则生财。与“生财”有矛盾的不是“散财”，而是“聚财”，《大学》云“财聚则民散”。关于这一点，《大学》中关注到一个现象，以此来论证上述观点的合理性：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也就是说，违背常理得到的财富，终将失去。

回到财富问题上，美德是滋生财富的土壤，这是因为美德是聚集人的关键。有了人，共建事业平台变得现实可行，进而有财、有用。何以聚人？财散民聚，以财聚人。能常常惦记他人利益、为他人创造财富者，是真有德。

财富恒足的路径：生

财富，是值得追求的，而财富恒足，更为人们所渴求。《大学》中明确地谈到实现“财恒足”的路径，整体的指导思想在于“生财有大道”，具体的要点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也就是说，创造财富的人比较多，消耗财富的人相对少，创造财富时力说快行，用度开支时宽舒徐缓。在创造与消耗之间，把握好多少、快与缓的节奏，如此这般，则“财恒足矣”。

在实现“财恒足”的路途中，无论是“生财有大道”的整体指导思想，还是“生之者众”的具体要点，皆在强调一个共同的观念——“生”。“生”的本义指（草木）生长，引申为生育、出生、生产，也指创造、创生。财富恒足的秘密在于“生”、在于创造。但是，财富不会自己“生”出来，要靠“生之者”，也就是要靠人去创造、创生。

既然生财有大道，看来也有“小路”。关于生财的“小路”，《大学》中讲到“聚敛”型的财富观，引用孟献子的话，旗帜鲜明地反对聚敛财富，严厉批评那些聚敛财富者，说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据《论语》记载，孔子曾号召自己的学生们大张旗鼓地声讨弟子冉求，甚至不再承认他是自己的学生，就是因为冉求帮助鲁国的贵族季氏聚敛财富。看来，反对“聚敛”财富是孔子儒家一贯的主张。这样看，“共创共享”的意识和理念，早在先秦儒家那里就诞生了。

就《大学》的本义而言，很明显，生财的大道是就国家的财富体系而言的，那么，面向个人，它还具有意义和价值吗？答案是肯定的。经典的妙用在于它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有着举一反三的思维方式，以期润泽每个人。

财富不会自己“生”出来，就个人而言，要坚定地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就个人言之，在创造财富上多行动、多努力，在消费开支上量为出，莫被形形色色的消费透支、消费贷遮蔽了心智，如此，则“财恒足”矣。

正用财富的智慧：仁

滋生财富需要美德，生财要走在大道上。那么，使用财富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呢？《大学》中提出“仁者”能正确地认识财富、使用财富，讲到“仁者以财发身”。反观“不仁者”，他们奉行“以身发财”。“以财发身”，说的是正用财富的智慧，是仁者的美德；“以身发财”，意味着将人生价值与财富本末倒置，是不仁者的行径。

如何理解“以财发身”？以，这里作使用解；发，有发起、发扬、发越、发明的内涵，寓意着振奋向上的气象；身，代表自身，引申为自身所处的位置，也指生命的价值。“以财发身”讲的是使用财富与修身的关系。财富是工具，提振生命价值是目的。关于“仁者以财发身”，它的本义在讲，在上位的仁人、君子面对财富时，务于施与，正用财富，成就美

名。这样的仁者，为儒家所歌颂；“不仁者以身发财”，说的是利用自身职位之便，贪于聚敛、敛财致富。这样的不仁者，为儒家所不齿。

在今天，“以财发身”的财富观适用于每个人。毫不夸张地说，当下，人们生活在一个有史以来财富状况最为自由的时代，和生命安全一样重要，财产安全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财产所有人可以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正因为使用财富是如此自由，正确使用财富才会变得更加重要。再谈“仁者以财发身”，真正懂得财富之道的人，知道以财富修身、以财富养道，将财富用在善待他人、提升自己上。最终，将人生的价值安放于完善人格的追求、提升人生的境界，方是正途所在。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作为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在人生价值的实现过程中，财富又扮演何等角色？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在以《大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中，我们也能看到，先贤先哲们已经有很多思考。财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可是如果只谈钱，恐怕人生的道路会发生偏航。《大学》中的财富观根植于儒家的整体思想之中，始终将修身立德置于人生追求的最前方，以道德来引领生命的航向。自然而然，道德也可以引领财富的航向。事实上，唯有对于修道德者、仁者而言，财富才能真正具有价值。

历史文化

典籍